

鄧喬彬學術文集

第二卷

比较诗学

邓乔彬 著



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

本文集由晨讯科技集团、暨南大学211工程第三期项目赞助出版

鄧喬彬學術文集

第二卷

比较诗学

邓乔彬 著



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

责任编辑:潘 安 祝凤霞

装帧设计:丁奕奕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比较诗学 / 邓乔彬著. — 芜湖: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3.8

(邓乔彬学术文集; 2)

ISBN 978-7-5676-0144-4

I. ①比… II. ①邓… III. ①比较诗学—文集 IV. ①I05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300070 号

比较诗学

邓乔彬 著

出版发行: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

芜湖市九华南路 189 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

邮政编码:241002

网 址:<http://www.ahnupress.com/>

发 行 部:0553-3883578 5910327 5910310(传真)

E-mail:asdcbsfxb@126.com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安徽芜湖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:2013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:787×1092 1/16

印 张:27.75 插 页:4

字 数:594 千

书 号:ISBN 978-7-5676-0144-4

定 价:58.00 元(平装) 68.00 元(精装)

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、残破等质量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。

总 序

孔子说：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。”我今年七十周岁，应以之对照反省并思考其中原因了。

孔子以六艺授徒，实行全才式教育，我于1956年考入华东师大附中，勉强可算“十有五而志于学”，却已开始偏科。试前突击可考数、理、化优良，日常所好却为文哲、史地与艺术。高中再入师大附中，不久就被调到区体校，虽安排就读于同是名校的复兴中学，兴趣使然，偏科更为严重。直到高三，情况始变：体校为兼顾运动会得分和高考录取率，全班仅剩十七人，在最小的教室上课，一流老师讲课，我虽近视未戴眼镜，仍看得清又听得明，能集中思想学习。我不仅是文、史课代表，空间解析几何、有机化学等课程的测验、考试也几为全优。学业之进，使我误以为自己能做到文理兼长，因看到了历年对《红楼梦》研究、对胡适思想、对诸多文艺现象和人物的批判，深感“文科危险”，于是，在高考的选择上，决定报考理工科。我有绘画之长，又爱制作船模，原欲报考同济大学建筑系或上海交大造船系，后来却突然生变。原因是：在六月举行的上海市中学生运动会体校组比赛中，我获得跳高冠军和三项全能亚军，被观战的华东师大体育老师相中，劝我报考师大。他告以师大物理系毕业生多分配至高校或科研单位，到中学的仅百分之五。而因经济困难，我曾对父母许诺读大学不要家里负担，师范生由国家提供膳食，能不爽所约，故而听从所劝，改以华东师大物理系为第一志愿，并被录取。

入学后，开始还信心满满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却对学习越来越不感兴趣。尤其是高等数学，常布置几十道题，有时竟然半天也解不了一题，使我深感烦恼。有次实验，一女同学失手损坏了仪器配件，被命赔偿，她的痛哭使我难以平静，就此视实验为畏途。我住在运动员宿舍，见文科生毫无作业、实验负担，同室一位羽毛球队员读中文系，是印尼归侨，曾说：“我们的同学真厉害，高中就读过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红楼梦》！”听此叹慕，我心中暗笑：“这些小说，鄙人小学时就读过了，岂

止读过，人物和情节都能随口说出！”我深感文理科的苦乐不同，心想：“毕业后拿一样的工资，何必要读物理系？学得如此之苦！”为此，因高考弃长取短、选择了理科而后悔，开始有转系之念。

那时的高校，转系极难。我先向物理系提出转读中文系的申请，未得理睬。后听说，有一数学系转中文系的学生，曾向市委书记柯庆施写信，历尽周折才得批准，且必须从一年级读起。我当然不愿去中文系“留级”，更不愿在物理系勉强升级，决定破釜沉舟、“舍命”一搏。于是，所有的专业课都亮起“红灯”，以证我不宜在物理系学习；同时，正式提出转读中文系二年级的申请。在受阻于物理系、教务处之后，我决定写信给校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常溪萍，申明要求转系的理由。常溪萍抗战时入党，曾是山东的模范专员，保持老八路本色，经常出现在学生宿舍、食堂和运动场，爱打篮球，曾多次看我跳高，认识我。我刚入学，就在新生运动会上破了校纪录。1963年参加高校运动会，所有高度都一次过杆，最有希望夺冠，却在跳1米86时，心想过此高度将集冠军、高校纪录和一级运动员于一身，杂念一生，三跳失败，仅获亚军。虽如此，我仍是华东师大田径队的“希望之星”。我候在丽娃河桥畔，见他经过，把信交他手上，只说：“常校长，这是我要求转系的信。”转身就走。不久，教务处约我谈话，认真听取我要求转系的理由，后又同意我参加中文系考试，以决定能否转读二年级。事后得知，这是奉常校长所命而办，而常校长之所以同意我转系，主要不在于我是学校的优秀运动员，而是通过查阅高考作文卷，知我所写《雨后》一文似是得了理科生的最高分，这是可以转读中文系的重要理由和依据。

因期末考试已过，我被安排参加中文系一年级的补考，所有课程都通过，优多良少，我终于没成为“留级生”，在1963年下半年转到中文系二年级就读。这年冬天，成为一级运动员，自感学习上驾轻就熟，大有余力读书。次年春，我以1米92打破1米86的上海高校跳高纪录，距新的运动健将标准仅3厘米，是全校最有希望成为健将的人选。我开始酝酿学习与体育双优的计划，期待毕业能留校工作，走上高校教学和文学研究的道路。

但是，在中文系仅读了一年，1964年10月，全年级同学就被命参加“社教”工作队，到安徽农村搞“四清”。先是“访贫问苦”、“扎根串连”，后是“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，从全椒县到定远县，先后参加了三期运动。1966年5月，结束“社教”，恢复了大学生身份，

回到学校。但随即“五一六”通知下达，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真正拉开序幕，我在无“学”、不“学”的大学度过了“乱也看惯了，篡也看惯了”的两年多。好不容易在被拖一年后，于1968年毕业分配。五年制的大学六年毕业，我实际上只读了一年物理系，一年中文系，在“四面向”（厂矿、农村、基层、边疆）的潮流中，被分到甘肃永登水泥厂。服从建材部安排，我于1968年9月到江苏南通长江边的东方红农场，接受解放军的再教育。战天斗地，劳动一年半，于1970年3月结束锻炼。5月初到甘肃永登水泥厂报到，开始在黄土高原的山沟接受工人阶级的永久性再教育。

我先被安排随政工组挖防空洞，后到原料车间，每天推小车，数月后，再被分到班组，当了三班倒工人。一年多后，职工子弟小学一位体育教师调回老家，厂政工组找我谈话，令去学校顶缺，理由是我不久前获兰州市首届运动会跳高冠军，教体育很合适。我认为自己虽能当专业教练却教不了小学体育，在压力之下还是顺从了。每天面对小麻雀般的一二年级小学生，和“我们今天玩什么”的发问，我只能摇头苦笑，唯求不出意外，何有教学可言！一年后，我改任职工子弟中学的军体课，课余还曾满怀热忱训练学生田径队。后被同事告知：校长对我教体育穿运动鞋和运动服、戴太阳帽（均自费购置）很不满，认为是资产阶级作风，差点过不了转正一关。在教了近两年军体课后，我“归队”当语文教师，而因“阶级”的嫌疑，冷却了对学校体育事业的热心。

很快就到了“而立”之年。难出于时代之外，此时的我是不“学”又未“立”。应付每周十二节语文课兼一个班的班主任，每周三个晚上的学习毛选、马列，是极其容易的。在“知识越多越反动”的年代，不必“给人一杯水，自己要有一桶水”，此时除了马列、毛选，实在无书可读，我仅是利用为厂文艺宣传队创作节目的机会，借口找参考书，在厂图书馆发现了几本藏在角落的外国小说，读了以前未读过的梅里美《嘉尔曼》、《高龙巴》等书。

黄土高原的杨树叶生生落落，我的生活在“看人儿女大，为客岁年长”中循环……终于到了1976年，周恩来、朱德先后逝世，唐山大地震，毛泽东逝世……不久，传来了一举粉碎“四人帮”的消息，举国欢庆之后，很快就是一系列的拨乱反正。终于，在1977年听到了恢复高考的喜讯，不久又传来研究生招生的消息。“伤痕文学”的出现，促使人们反思“文革”，陈景润攻克“哥德巴赫猜想”的报告文学，更鼓舞了许

多人,“志于学”的时代终于来临了!我在1978年春报考了古代文学研究生,以母校华东师大为第一志愿,在永登县城参加考试,除俄语外,其他三门课自感较好。在等待中得到了复试通知,却因夏天的洪水冲断宝天铁路,只能向厂领导申请乘飞机回沪,且不顾只准飞兰州到西安的批示而直飞上海,参加复试。9月,收到录取通知,我成为了“文革”后“黄埔一期”研究生,得以从中年开始“志于学”。

三年研究生,是我真正的读书期。深感本科六年、毕业十年的无学,蹉跎岁月之痛,激起了学习的热情。我尽废以前所好,停止了体育锻炼,渐入学术之门。1981年,研究生毕业,留校工作,既是我学术研究的继续,又是逐渐开拓的起始。很快就进入“不惑”之年,对于人生之途自无所“惑”,而对学术问题则“惑”者甚多,因之而兴趣渐广。我先是为写研究吴梅的硕士论文而用力于戏曲和曲论,后因兴趣主要在词而转向唐宋词与词学批评,以上研究领域的相关成果分别是《吴梅研究》与《唐宋词美学》二书及参撰的《中国词学批评史》,还有多篇词学论文。而因唐宋词与词学批评分别被同事设为选修课,且作为科研主攻方向,我就避之而将研究转到了古代诗画比较。这一转向并非有意作跨界研究,而是或因我青年时对诗画皆有所好的“情结”所致,此时因浸淫学术而多了几分中年的理性,虽未能用力于诗画创作,却对研究二者尤其是比较其异同感兴趣。遂从钱锺书先生的两篇论文及所提出的问题出发,写出了古代诗画比较的讲稿,以此稿开了多年的选修课,并据此而写成、出版了《有声画与无声诗》一书。此书被一书评称为“中国的《拉奥孔》”,虽或过誉,但也确是点出了构建中国古代诗画比较理论体系,揭示民族特色的意旨。

《吴梅研究》初稿成于1981年,出版于1990年底,历时近十年;《有声画与无声诗》成稿五年后,才于1993年出版。《唐宋词美学》1993年出版,《中国词学批评史》1994年出版。以上四种著作,都出在五十岁左右。而因前两者的出版历尽艰难,使我真正懂得学术研究成果的面世受制于市场,这就改变了以前的观念,大概可算是我的“五十而知天命”了!

虽然上述的专著、合著都出版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,却是我八十年代“学”之所成,所以这十年之所“治”,主要是词曲与诗画之学。

1988年起,我受命参与华东师大文科第一个复合型硕士专业的筹建,开始指导这一名为“中国文化建设”方向的硕士生,又有授课的任务,

遂用了很多时间阅读文化学、文化史著作，结合我国古代的文学与艺术，写成《中国文化与文艺》讲稿。除了为这一方向的硕士生授课外，又在中文系各层次、范围的学生中以选修课讲过多次。在讲述十年后，写成《古代文艺的文化观照》一书，作为我主持的教育部项目成果，在2003年出版。在研读文化学、文化史的过程中，我一度对图腾、民俗颇感兴趣，曾费时费力地借助放大镜阅读影印版《二十五史》，企图从古史记载中寻找图腾制的遗迹，欲写《中国图腾艺术史》。此事虽未行，却因对文化学、文化史及中国古代史著作的阅读，引发出对史前文艺与神话研究的兴趣。适逢中文系有人主持撰写二十世纪中国美学研究丛书，以人为题，确定了十位对象，将其中的闻一多研究交给我，我虽因读了俞兆平的《闻一多美学思想论稿》而自感难以再作全新之论，却因对闻一多用文化人类学方法研究神话、《诗经》的兴趣，而将论题扭转到对闻氏的古代文学研究作文化的观照，与赵晓岚合作，写成了《学者闻一多》。

与上述研究几乎同时，我又延续了对诗、画的研究兴趣。《有声画与无声诗》出版后，因感到西方是力图拉开诗与画的距离，而我国古代却着力于诗画的融合，可是，诗与画毕竟所属不同，艺术介质、手段有异，虽可比又不可比，为此而生分写《中国诗歌思想史》与《中国绘画思想史》之念。我以先生后熟为原则，先作后者，全书百万字，始于1994年，因有集体项目和教学任务，主要用暑假写作，耗时四年才完成，也同《有声画与无声诗》一样，经历了曲折的过程，才在成稿三年多后出版。此时，已入新世纪，同事萧华荣的《中国诗学思想史》已出多年，使我只能将另一选题调整为《中国诗歌艺术思想史》，却因对能否出版的疑虑，令我不敢贸然动笔。而因2002年接受暨南大学之邀担任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，则更使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改变，这一写作计划终未能实施。近十年之后，出版拙著《中国绘画思想史》的贵州人民出版社要我自报选题，争取国家出版基金资助，而此时经历了一场大病，我的健康状况已不允许再写大部头著作。于是，我的诗画之学就只能终止于这种跛腿的状态了。

九十年代的十年，我的治学既延续了诗画之学而偏在绘画，又新辟了文化与文艺的宏观关系研究，还在学术史范畴以学者为对象继作“研究之研究”。以上三方向的成果，就是分别出版于2001年的《中国绘画思想史》，2003年的《古代文艺的文化观照》，2001年的《学者闻一多》。三著的出版，在我六十岁左右，此时的辨识力已较前为高，虽非和

光同尘，却听到的多能泰然入耳，看到的也见怪不怪，虽无反潮流的勇气，却能不跟风而动，此或为我的“六十而耳顺”之义。

2002年底，为申报古代文学博士点及中文一级学科博士点，我被借调到暨南大学，担任学科带头人，次年，前者得批，后者未就，我正式调入暨大。河南大学出版社的《宋代研究丛书》已出多种，或因我有《中国绘画思想史》之作，向我约写《宋代绘画研究》。成约于2002年6月，而因我的调动，应对多事，虽只用了半年多撰稿，成书却已在2004年8月，出版则是2006年10月了。我的学术兴趣屡转，虽不怕“学书不成学画，学画不成学塑”之讥，却因只问耕耘、不问收获，从未在各界求取认同，故似只有词学界还将我看作“自己人”，因此而有回归词界之想。我先应上海古籍出版社之约写了《宋词与人生》，又在该社出了《词学廿论》，在齐鲁书社再版了《唐宋词美学》，以维持先入为主的词学学者形象。2004年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唐宋词的形式与艺术发展史”获批，为应对考核而发表了30多篇论文后，我在2007年一年内完成了《唐宋词艺术发展史》的百万字书稿，三年后正式出版。

我曾有二十年的体育锻炼和体力劳动史，自三十五岁重回大学以来，为追回岁月，就停止了锻炼，虽自感体能退化，却无明显的不适，为之还自我调侃：“青年时应是狮子老虎，老年时要像乌龟王八。”而实际上我不应提前进入“乌龟王八”状态，故从中年起已因久坐不动而疾病暗生。1999年，第一个验血指标高出临界，此后各指标逐年飘红，渐成“三高”人员，本应重启体育锻炼，却停不下高强度研究的脚步。因多年的连轴转，健康严重透支，终在2009年大病一场，躺上了手术台。此时，我才意识到体育锻炼确应是一生之事，对于运动员出身的人尤应如此。悔之晚矣，亡羊补牢，却已非其时！我只能停止了将要进行的研究，为自己的学术生涯不情愿地划上休止符。

从前曾流行过“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”的口号，我的真正为学始于三十五岁，应工作到八十五岁，但因健康亮起红灯，身患多种疾病，我只能止于七十。这本是“从心所欲，不逾矩”之年，我虽不逾法度规矩，却受制于健康而不能从心所欲了。有了这一清醒认识，我只能中止原先计划，仅在出版《唐宋词艺术发展史》后，于2011年再版了《中国绘画思想史》插图本，旋即开始整理三十多年的著作、论文，拟在七十周岁时出版自己的学术文集，就此将“换一种活法”，以度余生。这样，原先计划要写的几种著作都不能付之实施了。按先后，这些著作是：《进

士文化与唐诗》、《中国诗歌艺术思想史》、《中国韵文学概论》，以及力图构建新体系、体现“一代之所胜”的《中国文化史纲》，此外，还有一或两种词籍别集的校笺。

新著写作未成，旧作整理已就，如今，名之为《邓乔彬学术文集》的十二卷本将正式出版。十二卷文集分别是：

第一卷：《文化与文艺》，包括专著《古代文艺的文化观照》和相关论文七篇。

第二卷：《比较诗学》，包括平行比较与影响比较两个专题。前者是：专著《有声画与无声诗》，古代诗画比较论文一篇，中外比较诗学论文六篇。后者是：与陈学祖合作的影响比较研究书稿《现代新诗与古典诗词》三章。

第三卷：《文化诗学》，包括四组论文：文化与诗，十二篇论文；进士文化与唐诗，十二篇论文；诗歌美学，十篇论文；曲学及其他，十一篇论文。

第四卷：专著《唐宋词艺术发展史（上）》。

第五卷：专著《唐宋词艺术发展史（下）》。

第六卷：《词学三著》，分别是《唐宋词美学》、《宋词与人生》、《爱国词人辛弃疾》。

第七卷：《词学论文集》，包括：词学总论，十三篇；词人词作论，十三篇；词论研究，十篇；其他，八篇。

第八卷：专著《中国绘画思想史（上）》。

第九卷：专著《中国绘画思想史（下）》。

第十卷：《宋画与画论》，包括《宋代绘画研究》及研究绘画与画论的论文六篇，访谈一篇。

第十一卷：《学者研究》，包括《吴梅研究》与《学者闻一多》二著，及论述二人学术成就或研究方法的论文二篇。

第十二卷：《杂缀集》，包括六部分：第一部分是古代六十种画论著作所写的提要，第二部分是九十二篇古文的提要，第三部分为序跋后记，第四部分为学习笔谈，第五部分为发言、讲座稿，第六部分为作品赏析。最后附有作者分年度的著作、论文、文章目录。

回顾七十年的人生，恰以1978年三十五周岁为界：此前是在中学、大学偏科、移易的“志于学”与不能“学”之十多年，学工、学农、学军的数年，不能给人以学、自己亦不能学的工厂子弟学校教师的七年；

此后则是真正在高校的为学、治学，经历了不惑、知天命、耳顺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生命历程、节点。十多年的蹉跎岁月，即使放弃体育锻炼及诸般爱好，也难以追回！若老天能再给我以十多年的健康岁月，本应有逾千万的文字用于结集的，如今却只能止于古稀之年而仅得六百多万字。不过，人们常说，学问是做不完的，念此也就不必自责、自叹了。

本文集的出版，先得暨南大学第三期 211 工程经费的资助，所缺的大半费用由晨讯科技董事长杨文瑛女士赞助，在我筹款无门、不得已而向这位从无联系的初中同学求助时，立即就得到她的无条件应允，随即将钱款打入出版社账户。对此，实在是难以表达我内心的感激之情！本文集的整理、出版，得我沪、穗两地历届的博士生、博士后助力甚多，分别负责各卷的整理、校核者是：

第一卷：刘兴晖、金国正

第二卷：陈学祖

第三卷：彭国忠

第四、五卷：刘兴晖、昌庆志

第六卷：吴思增、王毅

第七卷：杨柏岭、仲冬梅

九卷：李杰荣、刘兴晖、王嘉、陈建穰

第十卷：何平华、汪涤

第十一卷：李俊（委托刘晓亮）

第十二卷：程刚、夏令伟

文集能顺利出版，衷心感谢他们！

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将本文集列为重点图书，社领导统筹安排，诸位编辑兢兢业业，特此致谢！

围绕为学主题，回顾五十多年人生历程，权以为序。啰嗦之至，望读者谅之！

邓乔彬

2013 年 5 月 22 日

本卷提要

本卷所收为比较诗学的专著与论文。第一部分为平行比较,收诗画比较专著《有声画与无声诗》,诗画比较论文1篇,比较文学论文6篇,共论文7篇;第二部分为影响比较,收专著《现代新诗与唐宋诗词》(未刊)书稿的3章。

《有声画与无声诗》正文8章,前有小引,后有结语,由徐中玉先生作序。

前四章论述中国古代诗画之异:

第一,就表现对象而言,诗与画经历代发展,分流渐显。早期诗歌“饥者歌其食,劳者歌其事”,绘画“图画天地,品类群生”;中期诗歌虽有游仙、山水之盛,但所写仍多在人世与人情,而绘画则转为以宗教题材为主;后期更呈现出表现对象的分流,可总结为:诗歌始终立足于人生(民生与民族),而绘画则走向自然(山水与花鸟)。

第二,就诗画的思想基础而言,也有儒学与道释的不同。先秦儒家倡《诗》,汉儒重《诗》,墨、道、法家不重《诗》,却有论画之见。孔孟的人道主义和人格精神,对历代诗人和诗作产生了巨大影响;而庄子的“无情”、“无己”、“心斋”、“坐忘”,则成为后代绘画的精神。儒家思想通向人间事业,而庄子和禅宗却向往幽深清远的林下风流。

第三,对诗画社会功能的认识,也经由了两千多年的发展演变而导致不同。先秦至汉,“诗言志”、“兴观群怨”以贯之;孔子论画的“明镜察形”、“往古知今”,延续在王延寿“诚世示后”,曹植“存乎鉴戒”中。陆机说“诗缘情而绮靡”,刘勰、钟嵘、裴子野、挚虞回归“言志”;“益仁智之善性”则是佛教与佛画功能的最好说明。“诗言志”经三次引申仍然屹立、坚持,而绘画经礼教化、宗教化,终至“畅神”论出现。

第四,历史最终确立了杜甫的诗圣地位,而文人画则以王维为尊。以杜甫诗风来衡诗在于“实”,以王维的画风观画却在于“虚”,“实”与“虚”成为了诗画批评的不同标准。儒家美学思想是通过“人为”而求“尽美”、“充实”、“全”、“粹”,在于“辞达而已”的“实”;道释则以“虚无为本”、“唯道集虚”、“随缘任运”而返于自然,在于“大象无形”的“虚”。

后四章论述诗画之同:

第一,中国古代诗画有诸多相异,“有声画”与“无声诗”一说,体现出诗画美学特征的融合。二者是指以山水为主兼及花鸟、静物的诗和画,互相汲取,互为补充。可从三方面看:时间艺术的空间感和空间艺术的时间性,诗的收空于时与画的寓时于空,诗的空间假借与画的时间凝缩。

第二,诗画分为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,在形象营造上却有趋同之势:导源于庄学、发展于玄学的言意之辨与形神之鉴,造就了诗画创作的共同原则。庄、玄的得意忘言,落实为诗的析词尚简,禅宗的不立文字则见于诗的简约与含蓄,前者为以少概多、以

小见大,后者为以景见情、象外见意。形神之鉴深刻影响了画论,神似、气韵、意兴成为普遍追求。

第三,王维“诗中有画,画中有诗”确立了诗画创作准则和品评标准。诗中画意是:视境鲜明,重神韵、情趣,非“形”所能尽而出之以“意”。画中诗情是:有感情、思想喻托,以非写实的画面让人“以神会”,从节奏上体验。求得诗中画意要由入而出,变实为虚,以动写静。实现画中诗情是从“物化”到“化物”,由工入写,拟容取心、别构灵奇。

第四,明末清初,南宗画与神韵诗标志着诗画的相通。山水南北宗论的合理性是:禅宗分宗与山水画分派都在唐代,二者地位及兴衰史相似。禅义对画意的影响:南宗禅“自开宝藏”与南宗画重主观发抒,南宗禅“随缘任运”与南宗画倡自然天趣。南宗禅的方法论也影响了南宗画:“不立文字”与轻形似,“直了见性”的“顿”教与南宗画的“根于性”。南宗画与神韵诗的共性是:借物写心与抒发情性,形似为末与意在言外,虚静得雅韵与仁兴成天然。

收入本卷的平行比较论文是:《诗画与虚实——论我国诗画批评标准的成因》及《从荷马史诗与西周史诗谈中西文学》。一组短文为中外文学或理论的比较,分别是:《荷马史诗与西周史诗》、《酒中有深味——陶渊明〈饮酒〉与莪默·伽亚谟〈鲁拜集〉》、《龚自珍与雪莱》、《王国维“境界”与叔本华“理念”谈片》、《阳刚、阴柔与崇高、优美》。

影响比较的论文由我与博士后陈学祖合作写成。原系陈学祖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,成果题为《中国现代新诗诗美建构与唐宋诗词》,收入本书者为其中部分。陈学祖写出草稿,再由我作较大的补充、修改而成。其后,他再行修改而成书稿。本卷所收是我当时的改写稿,与后出的书稿不同。现征得同意,命名为《现代新诗与古典诗词》收入本卷。

《现代新诗与古典诗词》分为三章。

第一章,意象与意境。第一节“互动与寻觅”,论中国现代新诗对欧洲象征诗派及其他外国诗歌的摹仿。第二节“民族的皈依”,论述新诗由外转内的变化,及其对古典诗歌的搬用、化用及回归的途径。第三节论新诗的意象类型与诗词传统。第四节从创作与理论论新诗意境的失落与追寻。第五节论新诗中意胜、境胜与意境两浑,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,意句、境句与动境、静境之异。第六节论新诗琢炼与平淡、雄浑与奇诡、含蓄与朦胧的各种意境。

第二章,声韵与体式。第一节论述汉语声韵与古典诗歌。第二节论新诗与声韵,认为新诗与旧体的最大不同是诗乐相离,为建立民族形式,诗人、论家对声韵作了许多探讨。第三节论新诗声韵的建构,分析常见用韵及特殊用韵。第四节论新诗的体式建构与中外诗歌资源,及新诗人尝试本土与学习外国的途径。第五节论述从诗词格律到新诗“三美”的历史进程,总结新诗的不同节奏与体式。第六节论新诗体式所受诗词散曲的影响。

第三章,语言与修辞。第一节论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同一性和异质性。第二节分别就白话的多种尝试及理论的多方探讨,从两方面论新诗诗人在语言转换期的努

力探索。第三节从三方面论现代新诗的语言策略与唐宋诗词的关系:现代新诗对唐宋诗词的借鉴,现代新诗与唐宋诗词的炼字炼意,新诗语言的个性化与唐宋诗词。第四节论现代新诗的修辞策略与唐宋诗词的关系,分论对偶与排比,明喻与隐喻,博喻与诡喻,象征。

另有论文 5 篇系《有声画与无声诗》正式出版前所发表,与书中部分章节大同小异,故存其目录而不收入本卷。

目 录

有声画与无声诗

序	3
小 引	5
人生与自然——诗画表现对象的分流	8
儒学与道释——诗画思想基础的界定	29
言志与畅神——诗画社会功能的演变	45
实与虚——诗画主体风格的确立	64
有声画与无声诗——诗画美学特征的融合	91
言意之辨与形神之鉴——诗画形象营造的趋同	120
诗情与画意——诗画艺术表现的互补	155
南宗画与神韵诗——诗画后期创作的相通	180
后 记	211

比较诗学论文

诗画与虚实——论我国诗画批评标准的成因	215
从荷马史诗与西周史诗谈中西文学	229
荷马史诗与西周史诗	238
酒中有深味——陶渊明《饮酒》和莪默·伽亚谟《鲁拜集》	242
龚自珍与雪莱	246
王国维“境界”与叔本华“理念”谈片	251
阳刚、阴柔与崇高、优美	255

现代新诗与古典诗词

意象与意境	261
声韵与体式	313
语言与修辞	385
论文存目	427

有声画与无声诗

